

三峡文化与 三峡开发



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编

三峡文化与三峡开发

主编 李玉秀

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为熊 徐士杰

崔葆章 蔡大康

CCNU

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编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李王季 主編

(炎黃文化研究委員會)

杰士翁 王武氏

蔡大東 蔡英華

三峡文化与三峡开发

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编

出版发行：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电话：26706633

地 址：香港上水新成路 123 号 3 楼

传真：26701382

印 刷：湖北省人事印刷厂

邮编：430071

850×1168mm 1/32 10.125 印张 249 千字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本 定价：20.00 元

ISBN962-450-419-9/D·47132

目 录

一个宏伟的历史命题

- 《三峡文化与三峡开发》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 丁凤英 (1)

(一)

- 三峡文化与民族精神 鲁 谦 (4)
独具魅力的三峡人文生态 王保金 (17)
试论三峡与三峡人的精神 邵和平 (25)
三峡精神及其时代意义 陈 晴、李新科 (33)
“天人合一”风韵探微 余育德 (39)
魅力无穷新三峡 韩永强 (49)

(二)

- 三峡文化的多元性及其成因浅析 王占华 (56)
国人源头在中国 徐自强 (64)
试论三峡文化中的早期历史文化 王善才 (75)
诗情画意满三峡 章旌红、韩致中 (83)
三峡诗文的美学特征与三峡景观 胡 敏 (89)
杜甫与三峡文化 赵 振 (101)

- 杜诗：三峡的文化宝藏 孙 云 (109)
委婉沉郁咏三峡
——论杜甫在夔州有关三峡的诗作 胡忆肖、邓先正 (115)
昭君文化大有可为
——兴山县昭君村的文化思考 周治陶 (121)
宜昌沮水道教石窟群初探 宫哲兵 (125)

(三)

- 弘扬三峡文化 促进湖北旅游 李志鹏、顾言华 (135)
三峡文化搭台 旅游文化唱戏 王文贵 (138)
民间历史名人传说
——三峡旅游文化的明珠 蔚家麟 (144)
八阵演兵与白帝托孤
——三国古迹为三峡增光 唐明邦 (153)
徐霞客与三峡 张春光 (158)
弘扬嫘祖文化 旅游名城添彩 秦兴友 (163)
西陵圣迹 光照千秋
——黄帝、嫘祖遗迹初探 曾继全、谭应炎 (168)
浅谈“野人”之谜导游 陈人麟、尹肖蔚 (174)
抓住三峡工程机遇 打造世界旅游名城 张金霞 (184)
新三峡·神农架——世界旅游金三角 戴 铭、尹笋君 (192)
试论宜昌市区旅游文化的定位与品牌构建 刘开美 (201)
旅游业：三峡经济发展的龙头 王慧岚、吴少华 (212)
促进新三峡旅游的跨越式发展 袁北星 (218)
发挥资源优势 打造产业大船 张照斌、杜本文 (225)

发挥文化优势 发展旅游产业	余学新 (235)
鄂西文化之旅的定位思考	毛运海 (239)
论三峡文化与湖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刘纪兴 (246)
三峡旅游可持续发展探析	张 勤 (248)
三峡库区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陈孝青、张家来、朱建新 (256)
三峡旅游重心“东移说”值得商榷	林 旭 (262)
经济与文化联姻	
——秭归旅游发展的沃土	彭仁松、刘宗灵、龙 芬、陶 怡 (265)
秭归县旅游资源调查	徐德宽 (275)

(四)

三峡工程——水文明的历史丰碑	王业扬 (291)
长江三峡工程的安监与防护	刘景禧 (298)
三峡库区的水质保护	陈绍娟 (301)
三峡移民与库区经济文化开发的思考	王玉德 (306)
浅议三峡地区自然生态的人文关怀	陈湘锋 (309)

一个宏伟的历史命题

——《三峡文化与三峡开发》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 丁凤英

同志们、朋友们：

盼望已久的《三峡文化与三峡开发》学术研讨会今天开幕了。首先请允许我代表这次研讨会的主办单位：湖北省文化厅、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湖北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向到会的省内外来宾和各级领导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问候，并预祝这次研讨会期间，大家以文会友，切磋交流，使这次研讨会能取得圆满的成功。

这次研讨会是在三喜临门的形势下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三中全会刚刚通过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使我们更明确地看清了奋斗目标，前进方向，更坚定了胜利信心，这是一喜。神舟五号载人航天圆满成功，对于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对于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对于我们这次研讨会来说，它提供了我们从太空时代、太空人的新视角思考三峡文化与三峡开发的新契机，这又是一喜。经济是基础，不久前，三峡工程二期工程胜利竣工，顺利实现蓄水、发电、通航，它是三峡文化和三峡开发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三喜临门”是历史的必然，它充分说明我们这次研讨会的召开，十分必要，也非常及时，而且完全具备了开好的外部条件。

我们这次研讨会群英荟萃，各方知名学者、专家和实际工作

者济济满堂，并得到各方领导的支持，特别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老会长李宝光，现任常务副会长鲁淳远道而来莅临指导，这说明我们也完全具备了开好这次研讨会的内部条件，我们完全有信心把这次研讨会开成一个闪耀着思想智慧光芒的文化盛会。我在这里要再次向宝光同志、鲁淳同志和所有来宾致以诚挚的谢意。

我们这次研讨的主题内涵丰富，意义重大。论述三峡文化和三峡开发，是一个宏伟的时代命题。三峡大坝在湖北，作为湖北人我们有责任积极参与这个重大命题的研讨，而且今后将持之以恒地研讨下去。无论这次会上或会后，我们都真诚地期盼学者、专家、各方人士畅述高见，著书立说，为三峡文化和三峡开发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做出自己的奉献。

以世界第一大坝——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为龙头的三峡大开发，标志着三峡文化和三峡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发展机迁期。如何从世界文明史和中华炎黄文明史的历史高度，高瞻远瞩，重新审视当代三峡文化的发展走势、地位作用；如何从世界经济史和中国经济史的角度，重新评估三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走势、地位和作用；如何与时俱进，把握机迁，为把三峡的事情办好献计献策。这将是我们这次研讨会的一个重点课题。谈到三峡文化和三峡开发的关系，有的学者从大文化的层面论述，广义的文化无所不包，等同文明，说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也就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冲突。这种大文化和眼下三峡大开发的关系，学者专家们多各陈己见已有不少论著。也有的学者从狭义的文化发展和经济开发的角度论述，提出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文化是经济的反映，两者互为依存、相辅相成，弘扬传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的目的就在于推动经济全面开发、社会全面进步。这方面也有不少论著正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我们希望这次会上对这些问题都能得到充分的交流切磋，以期开扩视野，共臻完美，真正

做到理论上有所创新，对实践有所裨益。

总之，我恳切的希望这次研讨会圆满成功。祝全体与会同志学术有成，身心健康，阖家幸福。谢谢大家。

三峡文化与民族精神

鲁 谙

正当举世瞩目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始蓄水、发电、船闸通航之际，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等单位举办以“三峡文化与三峡开发”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是十分适时的，并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长江三峡是中国的一大自然奇观，又有极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什么是三峡文化？三峡文化的内涵是什么，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可以通过研讨，各抒己见。在互相交流、互相启发的基础上，将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粗略地说，三峡文化应是巴文化与楚文化融合而成的区域文化。三峡文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三峡文化历史悠久。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中国最早的人类化石——大约200万年前的“巫山人”，正是出土于三峡地区的重庆市所属巫山龙骨坡；第二，三峡文化内涵丰富；第三，三峡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特色；第四，三峡文化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它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前所未有的开拓创新。第五，正因为如此，三峡文化有强大生命力，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更焕发出勃勃生机。“三峡文化与三峡开发”是一个内容十分广阔的课题，可以从多学科、多视角进行探讨。本文仅就三峡文化、三峡开发与民族精神的相互关联，略述己见。

一、三峡文化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标

志，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文化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一般说来，可以分成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等几大形态。而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和精髓，便是民族精神。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多种文化并存，而又互相激荡。我们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继承和发展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研究、探讨三峡文化与三峡开发，要着重挖掘蕴涵其中的民族精神，并发扬光大。

（一）三峡文化所蕴涵的民族精神，首先表现在对巴山楚水、三峡风光的钟爱与深情。

我们中华民族对于自己民族生于斯、长于斯的山河大地，历来充满执爱与眷恋之情。不论景色秀丽的南国风光，还是寒风凛冽的北国大地，不论西部地区的沙漠草原，还是东部地区的平原海洋，都是我们民族赖以生息繁衍之所在。尽管可耕地所占国土总面积的比例不大，某些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然而我们的国家疆域赐予我们民族以栖息之所和衣食之源，使我们民族得以发展壮大。今天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生活在这些大地上，我们有充分理由为此而自豪。对于我们民族的辽阔疆域、自然风光，历代诗人墨客为之写下了大量满怀深情的诗文，这正是中化民族精神的生动反映。

三峡有着举世罕见、独具特色的天然景观。那陡峭、奇险的高山峻岭，一泻千里的浩荡长江，早已成为人们赞颂的永恒主题，自古以来不知留下多少吟咏三峡豪迈壮丽景色的诗文。热爱三峡风光，赞颂三峡风光，不仅三峡地区人民如此，凡到过三峡和虽未到过而心向往之的人们，也都如此。“漓江月色”、“西湖美景”名扬天下，“三峡风光”别具一格。“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早已广为流传，而欧阳修诗中“西陵山水天下佳”（《寄圣俞》），也成为赞美三峡风光的名句。

最早全面咏颂三峡的，是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他过三峡时写下了《广溪峡》（即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等三篇。生动描绘了所谓“瞿塘雄，巫峡秀，西陵险”各具特色的景观。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更是题咏三峡的千古绝唱，表达了我们民族那种乐观向上、英勇无畏的胸怀。杜甫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前两句勾画三峡景色，悬崖峭壁之间，风过此更紧，天也显得更高。攀援于悬崖峭壁、古树密林之间的猿猴，是三峡诗词中经常描写的，还有那掠过江面的飞鸟，都给游人以深刻印象。后两句则表现了诗人亲历三峡油然而生的一种豪迈气概。三峡诗词，既有对其总体的描绘，也有各峡单独成篇的。至于沿江而下的各个古迹名胜，诸如夔门、白帝城、滟滪堆、八阵图、神女峰、新滩、屈原祠、昭君庙、黄牛庙、三游洞等，历代名人除上文已提到的外，白居易、刘禹锡、元稹、李商隐、苏轼等，在三峡地区或曾为官，或曾被贬，或曾游历，他们都留下大量诗文。连未曾亲临三峡的王安石，也写下了多首与三峡有关的怀古咏史的诗篇。这些歌颂三峡风光的诗作，是中华民族的高尚情操的结晶，是进行民族精神教育的绝好教材。

（二）三峡文化所体现的民族精神，还在于对于人民的关怀、同情与热爱

中国人民素以勤劳、勇敢、智慧著称于世。正是广大中华儿女的辛勤劳作，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使我们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为贵”、“民为邦本”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早在三千年前中国第一部诗歌总汇《诗经》中，就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大雅·民劳》）的警句，表达了关怀人民的生活疾苦，同情人民的辛勤劳作，为人民过上和平安宁乃至小康生活而奔走呼号的美好愿望。这也是

我们在新时期全面达到“小康”奋斗目标所借用的“小康”提法的最早来源。为维护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这既是中华民族生存、凝聚、延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根脉所在。

三峡诗文中，有许多对于人民的平凡生活、艰辛劳动和纯真爱情的描写。这反映了三峡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被尊为“诗圣”的唐代大诗人杜甫，55岁漂泊到夔州。此时他虽年老多病，仍常在游览峡江山水之余，写下许多描写三峡人民劳动生活的诗作。“农事闻人说，山光见鸟情。”（《移民夔州作》）农业对于自古以农为本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命脉所在，诗人对农事的关心是可以理解的。“白帝城西万竹蟠，接筒引水喉不干。”（《引水》）写下了三峡人民用竹筒把长江水引上高山供人饮用的生动情景。杜甫的三峡诗中，最能体现他同情贫苦人民的，是著名的《又呈吴郎》：“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穷困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杜甫在瀼西草堂居住时，堂前有几棵枣树，西边邻居一位穷苦寡妇常来打枣。后来他将草堂让给了吴某，吴却插上篱笆，不让打枣。杜甫写诗劝说。这首诗与杜甫著名的《三吏》、《三别》虽然题材有所不同，诗中表现的对于人民命运的关怀，却是一脉相承的。

在咏唱三峡人民生活的诗篇中，《竹枝词》是最富有特色的。《竹枝词》是从巴渝一带民间歌谣演变而来的，它着重于人民日常生活的生动描写，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因而深受人民喜爱。白居易写的《竹枝词》中的一首：“竹枝苦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煞江南病使君。”就流畅地写出了三峡男女的生活情景。至于刘禹锡的那首《竹枝词》，更加脍炙人口，为人们喜爱，而广为流传：“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

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诗中借景抒情，以“晴”、“情”两字同音，一暗一明，语隐双关，通俗易懂。曾经到过长江三峡的唐代诗人李商隐，在一个凄风苦雨的秋夜，长江涨水，他思念远方的亲人，吟出《夜雨寄内》（一作《夜雨寄北》）这首名篇：“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直至千年后的今天，一提起三峡，人们就会想到巴山夜雨，就会想到李商隐描写的普通百姓平凡而又执着的爱情（友情）。

（三）对于自己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的无限关怀，是三峡文化所凝结民族精神的更高境界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理念，对于中国人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中国人民在长期的斗争历程中，形成的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情操，就是这种精神状态的最高体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至理名言便是这种民族精神的精辟表述，用今天的话加以概括就是爱国主义。提倡以天下为己任，把国家、民族的利益置于一己私利之上，这种历史的责任感对于我们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起着巨大推动作用。

三峡的壮丽景色和淳朴民风，养育、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文化名人。其中最早而又最有影响的，当推战国时期楚国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他生于两千三百多年前，家乡就在今宜昌市所属秭归县。屈原怀着满腔爱国之情，提出进步革新主张，在遭到守旧势力的打击、诬陷、迫害后，仍不改初衷，最后被放逐贬谪。当得知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时，投汨罗江而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屈原一生追求真理、立志变革的生动写照；“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是屈原为了人民疾苦而呕心沥血的最好描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则是屈原为国效命、矢志不渝精神的自我表白。屈原一生所践行的中华民族精神，鼓舞了历代无数仁人志士为我们民族兴旺、国家强盛而献身。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杜甫这首以三峡名胜为题的五绝《八阵图》，短短二十字，借景怀古抒情，为诸葛亮鞠躬尽瘁未能完成统一大业表示遗憾，从更深层次来看，也抒发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

刘禹锡的不朽名诗《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有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虽然作于他离开三峡地区之后，但是首句即从三峡山水开始，并回顾包括曾在夔州住过两年的长期被贬经历。且不论“沉舟”、“病树”二句的具体所指，可能有不同的解释，它所形象描绘的新陈代谢的普遍规律，则是千真万确的，对于后人推进社会不断创新，具有重要意义。这里还应指出，刘禹锡的《竹枝词》，除了前面已提到的为人民喜爱和传唱的“杨柳青青江水平”那首外，还有同样通俗流畅而富有深意两首：“城西门前滟滪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恼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回。”“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自古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这里写的滟滪堆、瞿塘峡都属于三峡，诗中所揭露“人心”的阴暗险恶，有不同解释，既可说成一般商妇的愁怨，也有的认为是从更广的意义上讽世，是对于当时对受其诬陷排挤的社会势力的针砭。

（四）民族的和睦、团结是三峡文化所贯穿民族精神的重要特征

以汉族为主体、包括 56 个民族的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毋庸讳言，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也曾

经有过冲突与战争，但是从总体和主流来说，是“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的思想主导着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与世界其他一些多民族国家是不同的，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正因为如此，大一统的局面延续至今。我们弘扬民族精神，就要珍惜和维护这种来之不易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三峡文化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和睦共处和团结统一，起了重要作用。这突出地表现在“昭君出塞”的故事中。王嫱，字昭君，亦称明君，生于西汉时的南郡秭归。后兴山从秭划分出去，单独设县，昭君故里也就在今兴山县宝坪村。王昭君的事迹在三峡地区，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美丽的昭君在汉元帝时被选入宫后，未得宠幸，过着寂寞、悲怨生活，后来匈奴呼韩邪单于向汉元帝请求和亲，昭君应诏，远嫁北方，与呼韩邪单于结为夫妻，不仅为胡汉之间长期和睦相处做出贡献，还把中原文明带到了北疆，推动了汉族与匈奴之间的文化交流。“昭君出塞”也就成为民族团结的一段动人佳话。对于这段历史故事，来过三峡，到访过昭君故里的文人墨客，留下了诗篇。但是，多从昭君美貌、幽怨，因拒绝行贿，被画工故意画丑时，才后悔莫及的角度，发出各种感叹。如李商隐的《王昭君》诗：“毛延寿画欲通神，忍为黄金不顾人。马上琵琶传万里，汉宫长有隔生春。”就是从画工毛延寿因昭君未给其贿赂，而故意把昭君画丑了发出感慨，进而揭露汉宫的黑暗。王安石写过两首《明妃曲》的长诗，也着重于昭君在汉受恩浅、反而受胡恩重等发出议论。其中所谓“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荒没，尚有哀弦留至今。”这些都反映了诗人所处时代的局限。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从民族关系的高度，来看待和评价“昭君出塞”的一段佳话，跳出了历代文人墨客的狭隘眼界。“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这为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文化遗

产，更好地弘扬民族大团结精神，树立了榜样。

(五) 民族忧患意识是三峡文化所蕴涵民族精神的又一体现
以天下之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是儒家道德的理想境界，也是中华民族的崇高精神风貌。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产生发展的过程，都不免有各自的顺逆、兴衰的曲折道路。准备着“天将降大任”的志士仁人，不论何时何地，都要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而殚精竭虑。屈原的《离骚》就是忧患意识的最早代表，通篇贯穿着忧国忧民思想。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并且提出“进亦忧，退亦忧”的口号，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峡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这种民族忧患意识十分突出。曾任夷陵令的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就与范仲淹有着同样的广阔胸怀与“忧乐观”。景佑元年，政治改革家范仲淹遭宰相吕夷简诬陷遭贬，欧阳修写下著名的《与高司谏书》，高若讷将此信上奏宋仁宗，欧阳修因此被贬为彝陵县令。在彝陵期间，他写的《易或问三首》中，提出了“忧天下之心”、“虑万世之志”的思想。欧阳修的这种为天下忧心、为万世虑志的崇高精神境界，并不是偶然的。在此前后，他曾多次表述他的这种心境，多次提出“忧以天下，乐以天下”、“以天下之忧为已忧，以天下之乐为已乐”(《易童子问》)。可见，欧阳修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易传》的一句名言。欧阳修在《易或问》中，在提出自己对《周易》的看法时，通过对其中阴阳、吉凶、祸福相互转变的哲理，提出“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更明确表达了他的忧患意识。今天，我国通过改革开放，经济持久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为加强，然而，与发达国家比，还有很大差距，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与困难，因而决不能高枕无忧。对于历史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必须加以批判地继承，